



WEN HUA ZHOU MO

文学创作的选材与用料

□ 李春平

“遍地素材，无处下手。觉得要写的东西很多，什么都想写，却不知如何下笔，不知写什么。这就有个题材的选取问题。怎么选？你要选取在你的心灵深处最能够打动你的东西。”

作家心目中的现实可能大于真正的现实，一个作家眼中的历史不是我们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。作家创造的是一个文学宫殿，这个文学宫殿虽有时间标志、某些事件的影子，但总体来说不是大众认可的那种真实。

眼里却是一文不值。这就是个人审美观的不同而决定的。而对于初学者来说，你所处的现实生活平淡无奇、波澜不兴的状态下，你会感到茫然，感到没有价值，感到无处可写。因此你无法做出审美取舍和判断，甚至分不清哪些东西是最有价值的。这种情况是正常的。

但是，对于一个立志写作或喜欢写作的人来说，如果你总是觉得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写的，长期以来都是如此的话，那就很正常了。说明你缺乏发现美的眼光，说明你对生活比较麻木，说明你不那么敏感，说明你缺少感动的心灵，说明你缺乏想像力，说明你缺乏挖掘能力。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倘若对美不再动心，这就非常可怕了。一个俄国作家——帕乌斯托夫斯基《金蔷薇》的作者感叹说：“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面对素材一筹莫展更叫人难堪，更叫人苦恼的了。”那怎么办？那就下功夫多读书，就要多思考和分析问题，就要设法从沙子里面淘出黄金来。

现在我们来说第三个问题，就是如何从众多的素材中选材和用料的问题。

先说选材。选材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，一是选取题材，二是选取材料。关于题材的问题，必须要说远一点。在文革前，我们的文艺路线还是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，那时候的文艺界比较活跃。但在文革时期，特别提倡主题先行，盛行作品主题论。是不能写爱情的，不能写人性的，否则就会打成毒草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文艺作品的题材面是大大拓宽了，现在的文艺界基本处于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时期，不存在什么题材可以写，什么题材不可以写的问题。对于学生来讲，你可以写校园生活，可以写成长生活，可以写社会生活，可以写爱情生活。只要你想写什么，都是可以写的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我国有一批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，是艾芜和沙汀。他们在开始文学活动之后，曾经联名给鲁迅写信，请教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，鲁迅那封《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》，就是对他们的答复。可以说艾芜和沙汀是在鲁迅的关心下，遵照鲁迅的教诲而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。

再说第二个问题，生活平淡，没有素材。你面对的事物太多了，反而觉得无处可用，无处可写，多得毫无用处。那么你的眼里可能就是一片迷茫，空荡荡的。你要面对的素材到处都是，可也许你恰恰觉得你需要得到的素材到处都没有。那么你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素材呢？什么样的素材才是真正有用的素材呢？这个要根据作家的眼光出发了。从作家的个人经验上看，他们对素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有不同的审美眼光和写作需求，有不同的审美视点，有不同的写作经验。所以说，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，很难确定说哪些东西是有用的，哪些东西是没有用的。同是一个事物，也许在这个作家看来没用的东西，在另一个作家眼里就成了宝贝。也许在另一个作家眼里是价值千金的东西，在这个作家

最高展示！连体姐妹的最大奢望是“为了变成两个独立的个体”，这清楚地告诉人们——不依附他人的自我理念，充分体现人格的张扬，彰显本我的自尊，实践自主的理想，追求自由的独立，这才是人性本质的真正解放。进而推论，一个人应该如此，那么作为民族或国家呢，难道不希望独立自主，独行其道吗？我们常常讲认识事物的高度，这就是认识的高度问题。如果这种理解，就远远超出了从医学探索、个人勇气和笑对生死的层面去思考和观察问题的水平了。

我们继续讲取材的问题。

以《妻妾成群》和《我的帝王生涯》获得国际认可的苏童，被“重述神话”全球出版项目的发起者坎农格特出版社锁定为加盟作家。重庆出版社在加盟这一全球出版项目的同时，以此为契机，着手在国内策划《重述神话·中国卷》系列图书，意在邀请包括阿来、格非等在内的20余名作家，大规模地、系统地演绎中国各民族瑰丽的神话。最后锁定了苏童。

苏童的《碧奴》取材自神话故事“孟姜女”，但这是一个作家的再创造，作家已解构原有故事的人物形象，进行了重新塑造。孟姜女“哭长城”作为一个神话故事已经家喻户晓，“碧奴”作为孟姜女的一个新名字，和孟姜女的故事有很大的不同，因为这不是在记述神话文本，而是在进行一次作家个人小说的创作。不过，小说的故事仍沿用了原故事的主线，两者关系有若即若离的感觉。《碧奴》实际上是以神话为文本演绎的小说。在中国，神话是一种民间哲学的体现，是百姓对生存、命运的思考；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思维，具有强烈的幻想性。他们解决人的命运的方式也是稀奇古怪的，这种古怪的方式有时候会变成某种神话。孟姜女就是很好的例子。苏童对这个故事的兴趣不在于孟姜女哭断长城的故事放大了，精细化了，技术化了，把哭断长城的情节当成一个重要的事件在描述，从而返回到原始事件的真实状态中去，还原到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在上海作家中，还出现过两个有趣的现像。三十年代，茅盾的《子夜》取材于一则报纸新闻。茅盾受到启发，从这则新闻出发，写出了这部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位置的作品。九十年代，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也取材于一则新闻。一则新闻，无论长短，无论详略，显然都不足以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基本素材。那么素材的获得怎么办？那就需要走访，需要虚构，需要作家通过大量充分的想像来完成构思。上海市文联以前主办的一个刊物《电视电影文学》杂志，曾经有过一次大胆的文本的试验，把新闻与小说嫁接起来，让作家用新闻素材写小说。这个小说栏目的名字叫“新闻与虚构”，确实产生了一批不错的小说作品，但还是没非常出色的小说。为什么没有杰作出现？还是因为太拘泥了，作家首先要考虑新闻事实，然后才是虚构。这也就是说，你的想像被禁锢的，是受到制约的。你要有杰作，就必须自由放飞你的想像，让你的文学思想飞扬起来。（上）

苏童说，他写碧奴，是想让这个故事跟随我的心愿探讨民间哲学。孟姜女这个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人，即《左传》里的“……梁妻，葬路祈望吊唁”的故事。但它只是个简短的记录，几百字，现在要把它扩展为一个小说，并不是将历史的边边角角搬过来就可以，而是要靠作家的想像，靠想像让这一“真正的事实”飞翔起来。我们的民间神话里，碧奴其实是一个非常凄苦的形象，故事也是个悲情的故事。在他的小说中不可能把她完全颠覆，因为他要基本尊重原形，但也作了些解构。也

就是说，这个悲情的色调、意味有可能依然存在，不过它已经不是作家所关注的。他更多是在探讨她作为底层女性在人世间的现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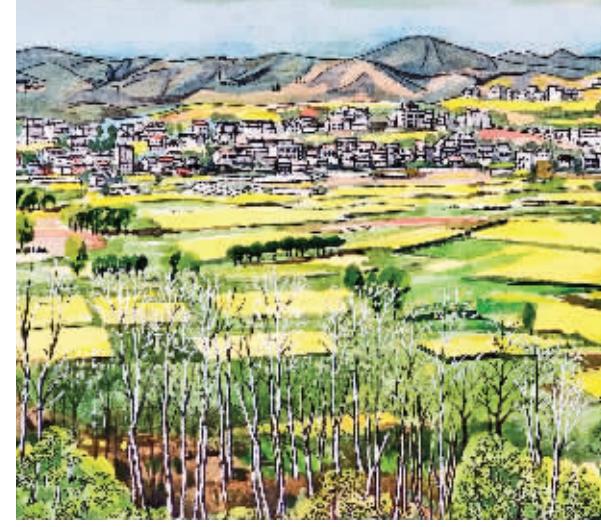
苏童不大想描述碧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，这个形象是什么样应由读者来判断。可能有人觉得离他心目中的形象很远，但也可能有人觉得很近。苏童认为，神话的形象在百姓心中其实蛮脆弱的，是在一次一次的建立，一次一次的修补中延续下来的；他写这部作品，是想去修补孟姜女这个人物形象，也就是说，想让她更大更丰满一些。而且这个人物形象所传达的意味，不光是我们大众所理解的悲情，更多的是捕捉、搜寻这个人物形象身上的哲学意味。苏童认为，中国人喜欢把情感的宣泄放在这样一种口头文化之中，故事趣味多是追求恶有恶报、善有善报等相似的人文伦理，当然，这也寄托了非常强烈的民间感情。他在写作中，既想尊重这种民间感情，但又不太甘心，于是他想从这种“俗”的成分中跳出来，将碧奴推向更高的人格情操中去。

与中国神话相比，西方希腊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人文精神。希腊神话里的俄耳甫斯、海伦、宙斯、潘多拉等这样的形象一开始起点就比较高，意蕴也比较丰厚。不过我们的民间神话也不能一概而论，比如说家喻户晓的愚公移山的故事，它传达出来的不仅是人的恒心、辛苦，还有更深层的人与世界如何相处，人与世界的抗争方式等等。孟姜女这个故事，其实很多人没琢磨出来，一琢磨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悲情故事。让他产生创作这部小说的冲动，其实是因为会安排一个女人的眼泪掉在坚固的石头上，并且一下子倒掉了八百里。倒掉几百里并不重要，而是它安排一个女人的眼泪他觉得很神奇，也非常有想象力。这里其实是有我们的价值观、生活态度等中国特有的人文精神在里面。你看，代表最软弱的东西可以摧毁最坚固的东西。这次他因为要写这个故事，大量接触到了魔幻作家和魔幻小说，在他看来，魔幻和魔幻主义并不是创造，而是一种文化资源的吸收和传承，魔幻不是一种创造，而是一种继承或发展光大。

我们现在讲取材、讲用料的问题，为什么要把苏童写孟姜女的故事搬出来呢？我们可以发现，苏童写孟姜女抓住的是最感人的地方，即：他抓住了孟姜女的眼泪。他把孟姜女哭断长城的故事放大了，精细化了，技术化了，把哭断长城的情节当成一个重要的事件在描述，从而返回到原始事件的真实状态中去，还原到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在上海作家中，还出现过两个有趣的现像。三十年代，茅盾的《子夜》取材于一则报纸新闻。茅盾受到启发，从这则新闻出发，写出了这部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位置的作品。九十年代，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也取材于一则新闻。一则新闻，无论长短，无论详略，显然都不足以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基本素材。那么素材的获得怎么办？那就需要走访，需要虚构，需要作家通过大量充分的想像来完成构思。上海市文联以前主办的一个刊物《电视电影文学》杂志，曾经有过一次大胆的文本的试验，把新闻与小说嫁接起来，让作家用新闻素材写小说。这个小说栏目的名字叫“新闻与虚构”，确实产生了一批不错的小说作品，但还是没非常出色的小说。为什么没有杰作出现？还是因为太拘泥了，作家首先要考虑新闻事实，然后才是虚构。这也就是说，你的想像被禁锢的，是受到制约的。你要有杰作，就必须自由放飞你的想像，让你的文学思想飞扬起来。（上）

在上海作家中，还出现过两个有趣的现像。三十年代，茅盾的《子夜》取材于一则报纸新闻。茅盾受到启发，从这则新闻出发，写出了这部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位置的作品。九十年代，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也取材于一则新闻。一则新闻，无论长短，无论详略，显然都不足以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基本素材。那么素材的获得怎么办？那就需要走访，需要虚构，需要作家通过大量充分的想像来完成构思。上海市文联以前主办的一个刊物《电视电影文学》杂志，曾经有过一次大胆的文本的试验，把新闻与小说嫁接起来，让作家用新闻素材写小说。这个小说栏目的名字叫“新闻与虚构”，确实产生了一批不错的小说作品，但还是没非常出色的小说。为什么没有杰作出现？还是因为太拘泥了，作家首先要考虑新闻事实，然后才是虚构。这也就是说，你的想像被禁锢的，是受到制约的。你要有杰作，就必须自由放飞你的想像，让你的文学思想飞扬起来。（上）



花开时节

杜娟 作



主持人:张思成

教师文学有两类，一类是以教师群体为主创人员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，另一类是以教师职业形象为素材创作的文学作品。从安康的教师文学来说，第一类占主体地位。安康教师写作群体从人数上来说，在整个安康的文学创作者中占很大比例，所涉及体裁也比较广泛，作品数量庞大。

小说创作方面安康学院李春平教授自然是领军人物，作品数量多，内容广，故事耐读，思想性强，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。安康职业技术学院邹服生老师的《解放慢班》十多年前在《教师报》连载，唐玉梅中篇小说《抢黄》获安康市现实文学创作二等奖。安康教师诗歌创作群体比较大，熟悉的诗人如白怀岗、侯云芳、章开玲、周益慧、杨运菊、朱世江、李典刚、汪海玉等，这几年均有大量优秀作品呈现。诗人白怀岗一度被大家称为发表“专业户”，一年有几百首诗歌创作发表，他的诗时而宁静如月，时而亮丽如春，语言朴素简明，如他的工作地叶坪般幽远深厚。

其他的诗歌创作者也各有所长，或叙事，或哲理，或小我，或大众从不同角度书写安康特色。教师散文的创作是安康教师文学创作的主流，谢开云、张朝林、唐玉梅、王娅莉、温洁、胡自兴、卢慧君、朱焕之、李华磊、唐承琴、郑军、龚甲庆、石昌林、李永恩、钱贞、郑宝琴、刘晓红等众多老师从自身工作与生活中提炼美文，在各类报刊网络媒体各展风采，成就斐然。安康教师文学评论以安康学院姚维荣、戴承元、孙鸿教授为代表，先后有朱云、杨明贵、韩文霞、李爱霞、唐玉梅等加入评论队伍。姚维荣、戴承元、孙鸿的评论作品多年来在陕西具有一定影响力，带动了安康文学创作的阶段性热潮。朱云、杨明贵、韩文霞等安康学院老师是科班出身，他们的评论理论性强，站位高，对作者启迪性强。李爱霞、唐玉梅善于从自身阅读体验出发，融合生活情境进行点评。

安康教师文学创作涉及旅游美食、教学随笔、地方文化、生活感悟、系列读书笔记等多个领域。纵观各位老师的诗文，都有浓郁的安康文化特色，尤其是旅游散文和美食散文，阅读者众，追随者广。作为教师群体，也有其独特之处，课堂事、学校事、家长事、社会事一一呈现在笔端，易引起共鸣。其中女性老师笔触细腻，心理描写到位，善于在学生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间捕捉素材。男性教师文字宽厚，视角独特，文章大气磅礴，都为安康文学增添一道彩虹。

但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，安康教师文学鲜有头部，思想深邃，震撼人心的作品。报告文学基本是空白，中长篇小说创作除了李春平、邹服生外，少有人涉足。小小说创作虽时有佳作出现但却稀有。小说和报告文学是最有力呈现社会历史，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体裁。教师作为人教众多的文化人群体，既要接受时代风浪洗礼，又要承担传统文化的传播，既要和学生斗智斗勇，又要和家长坦诚相待。尤其作为班主任，既是学生快乐的源泉，也是学生心理垃圾回收站。当前因网络、社会环境、留守儿童、独生子女、二胎问题等造成的学生、学校、家庭矛盾冲击波，其实有很多好的小说素材，但一方面因老师职业的忙碌，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正把老师推到一个有“风险”的位置，社会压力巨大，大多数教师更怕触及社会敏感，所以在文学创作时尽量规避这些素材，其他如戏剧、影视等文学体裁，老师的参与更是为数不多。这方面的缺位，实在可惜。

文学创作虽说是个人行为，但集体行走力量更大，作为安康文学创作大团队，教师文学现在急需引领，急需一股春雨浇注，然后蓬蓬勃勃铺展开去。每个教师要多读国内外经典文集，打开眼界，打开思维，要深刻理解最难把握的师生之间、家校之间、教育与社会之间的矛盾，把这些题材写进自己的作品。做最真的事，写最真的文，让文字真正发挥救赎功能，感动自己，再感动更多的人。行走安康大地，用笔书写安康山水的壮美与柔媚，奔腾与静谧，引外人来安康游走。要有一颗博大的心，去容纳和接受批评，去书写更广阔的大千世界。文学评论要敢说真话，说实话，安康教师文学太缺理论指引和文学评点了。呼吁社会各层面包容教师的文学创作，各级各类文化部门多搭建平台，一些文学培训学习建议利用寒暑假举行，照顾教师创作队伍，让教师在忙碌的工作后汲取更高层次的营养。

李爱霞

漫谈安康——教师文学

